

社会与思想丛书

# 社群主义 及其批评者

&

丹尼尔·贝尔 著  
李琨译  
宋冰校

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



#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

[美]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著

李 琦译  
宋 冰校

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牛津大学出版社

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 by Daniel Bell  
English tex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美)贝尔著;李琨译 .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1713-X

I . 社… II . ①贝… ②李… III . 政治学  
IV . D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287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 数** 213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4.80 元

#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在大陆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旨在更有系统地积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们希望，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与思想丛书”将主要注重对西方社会与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70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经济领域，所谓“福特式大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促发对“后福特时代生产”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福特式生产”的历史成因及内在阙失：在政治领域，西方现存体制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发展的尖锐张力，已重新激发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 v.s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这一基本辩论；在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但已全面动摇近代西方苦心营构的文化秩序和价值等级，而且更进而对“西方传统性”本身发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

在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样全面重新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本丛书将不仅包括对当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强调对西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西方传统内在差异性的研究。

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与思想”，自然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对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应该日益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干。从学科的角度讲，亦即希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人文及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与跨学科的研究去深入认识中西现代性与中西传统性，以往那种僵硬的“传统 v.s. 现代”、“中国 v.s.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将会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学术世界为此任重而道远！

社会与思想丛书编辑委员会

# 致 谢

这本书是以我在 1991 年 2 月向牛津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修改而成。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帮助。但是,我最感谢我的论文导师,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米勒教授(David Miller)。这篇论文从令人汗颜的初稿到目前的书稿,应归功于他。

我的论文审稿人科恩(G. A. Cohen)和普兰特(Raymond Plant)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提供了许多书面和口头的意见(特别感谢我的蒙特利尔同乡科恩,特别是他高水平的激发人的学术标准,还有他的幽默感)。在麦吉尔大学,泰勒(Charles Taylor)主持了一次关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会,对我也有帮助;与布斯(James Booth)多次谈话加深了我对政治理论的兴趣。我还要感谢温斯托克(Daniel Weinstock)。他阅读了整篇论文,做了很有帮助的评论。我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金姆利卡(Will Kymlicka),他对论文的评论对我非常有启发,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包括在这本书里(见附录一)。

我还希望表示对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的朋友的谢意。国际化的气氛并不能给西方社群化社会研究提供

一个理想的环境,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国饺子的做法以及喝土尔其咖啡时谈论的中东政治。但是,任何人如果想了解远离家乡的社群,圣安东尼学院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妈妈,爸爸,安东尼(Anthony)和欧蒂尔(Odile),感谢他们给了我爱和鼓舞。

最后,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巴腾(Tim Barton),他很耐心地给我以鼓励;牛津大学的简斯(Karen Janes)和新加坡的詹丹(Rohani bte Jantan),他们向我提供了技术性帮助,最后让我感谢魁北克省和英国政府在我整个研究生学习阶段给了我资助。

# 引　　言

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属于许多不同类型的社群，如家庭、邻里；这些社团表现为无数社会的、宗教的、种族的、工作地点的、行业协会的，以及政治的等各种形式。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的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奉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单纯追求私利会腐蚀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体系，并将破坏我们共同进行的民主自治实验。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没有一个社群的观念，个人的权利就无法长期存在。社群观念既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人的生存的社会性。<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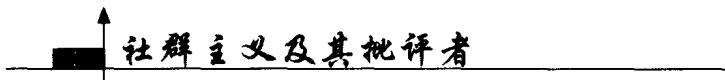
这就是“回应性社群主义宣言：权利与责任”的序言。这宣言是一份由五十多人签署的长达十四页的文件。这些人的共同“信念是必须以社群主义的观念来影响我们当前重大的道德、法律与社会问题”。<sup>2</sup> 无节制的贪婪，无根的心态，脱离政治进程，离婚率的增长，以及当代西方社会中以自我为中

心、脱离社群等有关的一切现象使我们许多人忧心忡忡。这个纲领的出现，将使他们受到鼓舞。它似乎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这个基础是当今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领域所缺少的。尽管如此，宣言只是宣言。政治思想家所宣传的社群主义观念必须既具理念上的吸引力，又有现实政治意义。因此我写了这本书——我试图更系统地说明社群主义的观念，以此引申出某些政治措施，其目的是阻止对社群化生活的腐蚀，给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脆弱的社会群体注入生命力。

然而，在谈到这一点以前，值得回顾的是，社群主义的倡导者曾经批评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因此，有必要简略回过头来看一下自由主义思想家及其批评者——社群主义思想家之间的辩论，<sup>3</sup> 这场辩论被认为是 80 年代英美政治理论的辩论焦点。<sup>4</sup> 为有助于我们检视社群主义观念，下面我就（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与其核心信条作一简单介绍，同时也就著名的社群主义批评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主要观点，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各种反应，作一追述。最后，我概略地提出我的论点并说明我的论点在上述辩论中的定位，以及我的论点如何超越了这场辩论。

## “左派新康德自由主义”

罗尔斯（John Rawls）于 1971 年出版了具里程碑意义的《正义论》<sup>5</sup>，多数当代自由主义者<sup>6</sup> 都是在此书确立的理论框



架中作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可以称该框架为左派新康德自由主义(left neo-Kantian liberalism)。罗尔斯重新制订并系统化了自由主义学说，几乎单枪匹马地反击了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两种对自由主义极具杀伤力的反对意见。

第一种反对意见是针对功利主义学说的。《正义论》出版前，功利主义学说在维护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反对意见声称，功利主义要求人为了某些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米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他可以用为社会全体成员创造最大幸福的名义来捍卫自由主义的正义。<sup>7</sup>但是，肯定地说，有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要求，采取道德上有害的行为。下面借用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所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加以说明：

如果在12个人的社会里，10个虐待狂从对其余两个人施酷刑中得到巨大的快乐，那么，功利原则就表明那两个人应该受酷刑吗？<sup>8</sup>

假如因为两个人受酷刑而使总体幸福更大些，那么，功利主义者只能赞同施酷刑而几乎别无其他选择了。由此看来，对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来说，功利主义哲学并非一个足够的理论基础。<sup>9</sup>

政治左派中的批评者争辩说，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需要一个物质基础。这是《正义论》出版前的第二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反对意见。维护言论自由、平等公民权之类的自由主义价值固然很好，但是，自由主义没有就容许那些价值实现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发表过意见，因此，进步力量怀疑自由主义

思想主要是为了使有产阶级的统治永世长存而产生和存在的，也就无可指摘了。<sup>10</sup>

罗尔斯在康德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自由主义信条，从而成功地答复了第一批批评者。罗尔斯所维护的自由是带有根本性的，甚至社会整体利益也无法超越其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关键是建立在我们的能力与责任之上，利用康德主义的道德力量来形成、追求、并在必要时调整我们的人生计划，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主权。每个人在行使自决权时，都有他所追求的最高利益，而这一自决权只有在民权与政治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得以行使。<sup>11</sup>换言之，这些自由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使每个人都能行使自决权，而不是因为它们无限扩大了社会功利。

为了迎击政治左派的反对，罗尔斯辩称，由于任何人都不应仅因有天赋而得到奖赏，自由主义的平等要求至少要对天才与能力的不平等进行部分的补偿，也就是说不能用不平等的天资为不平等辩护，因为我们不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应该给他带来特殊优势。先天的社会优势并不能赋予人额外的报酬与资源。天赋的才能也不应左右人们的命运。<sup>12</sup>尽管这种观点可能引出没有任何人应该得利于他的天赋才能的结论，但罗尔斯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他深刻地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允许为在遗传抽奖游戏中最不幸运的人谋利益而使不平等存在就不能说是不公平的。简而言之，罗尔斯使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超越了过去，过去它只涉及公民与政治权力。他说，自由主义还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以保证公平地分配物质资源。个人不仅享有平等的公民与政治自由以追求和调整他们认为的美好生活，他们还有权享有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

同等的社会与经济资源，除非不平等政策可以给最不幸的人带来一定利益。在证明国家应该有重新分配的功能的同时，“左翼新康德自由主义者”还捍卫了国家中立的原则。<sup>13</sup>按照这一观点，国家不应鼓励任何一种美好生活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尊重人人都应有的自由，以便实现他们自己选择的美好生活。政府应该为个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以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善美。但是，如果它擅敢规定生活中什么是有价值的，它就是采取了不公正的行为，因为它限制了人的自决权。

## 社群主义倡导者对“左派新康德自由主义”的批评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被认为是反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社群主义批评家麦金泰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泰勒(Charles Taylor)和沃尔泽(Michael Walzer)还没有公开地认同社群主义运动。<sup>14</sup>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赞同过本引言开头提到的宣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为一些他们的追随者宣扬的思想所困扰。然而，他们有一种共同看法，即认为自由主义没有充分考虑到社群化社会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重要性，也没有考虑到它对道德与政治理念和关于当今世界的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在这诸多批评中，我们大致可以分辨出三类观点。

## 自由主义自我观

第一个观点认为，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过份强调自我的概念上面的。自由主义的正义首先是为了那些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理性个人的。其前提是，不论我们的选择结果如何，我们在生活的选择中都有一个明确追求的最高利益。言下之意，那些未经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感情依附则根本上是错误的。<sup>15</sup>但是，这种观点反映了我们对自我的真正了解吗？桑德尔说，我们通常认为自己是这个家庭或社群或国家或民族的一个成员，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那个革命的后代，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等等。<sup>16</sup>我们对某些社会关系的依附性往往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不是理性的选择。我没有选择爱父母，关心我孩童时代的邻里，也没有选择特别关怀本国人民。认为我选择了那些依附性或者我应该这么做的观点是颇令人费解的。

自由主义者仍然可能这样回答：即使如此，在生活中作出选择也是重要的，例如选择自己的职业和配偶。因此，政府应该向个人提供能使他们作出选择的权利与资源。然而，这种假定（以及其政治含义）也是可以辩驳的。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人。且把他们叫做甲和乙。甲认识到了运用自决力量的重要性，很早就决定制订自己的生活计划。读中学时，她就估量各种职业选择，考虑与每种选择相关的代价与好处，并且选择了将来成为商业律师。随后，她就选择了有助于达到该目的的大学，把她所遇到的多数人当作能帮助她在一个好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的“关系人”，并且在待人处事上面精于算计。

甲懂得怎样使事情为己所用，最后她达到了目的。在婚姻问题上，甲决定在事业稳固以前不认真对待任何人。她避免与人过于亲密，偶尔还要否决自己的直觉。到三十五岁左右，她已经事业有成，可以寻找婚姻伴侣了。但是，这时她依然决定小心行事。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不打算与任何人分享她已经继承的一大笔遗产。她还考虑，在她心中的其他标准以外，她的伴侣必须是美貌的、聪明的，并也是事业有成的。甲又心想事成了。结果，她结婚了，对象是在《纽约书评》分类广告中找到的一位男子。

相反地，乙从来也没有遇到机会行使他的道德上的选择权力。直到高中时他父亲迫使他在当地一个中心为残疾人做些工作，他才模糊意识到自己应做什么才好。最初，他觉得这个工作很困难，但是后来做得十分投入，很少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最后，他终于被一所大学（但不是很好的）录取，随便选了几门课，因为他不知道想学什么专业。到最后一年，他不太情愿地选了一门摄影课（他几乎没有时间上课了，因为他为残疾人工作时间很长）。但是他惊讶地发觉他真喜欢这门课，决定将来他要干摄影师的工作。但是乙在毕业后不久被军队征兵去保卫祖国，抵御某个纳粹国家的侵略。第二年，他和邂逅的一个女子热恋起来，暂时与资产阶级世界断了来往并在不久以后和她结了婚。朋友们问他为什么如此完全地与妻子跌入爱河，他只是自我满足地一笑，不能回答（乙一向口齿笨拙）。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人们在理性地选择事业与婚姻伴侣时，不一定遵循自己的“最高利益”；与此相反的是，却常常凭直觉行动，为别人（家庭、朋友、社群集体、政府、上帝）替他们

规定的目地与目标奋斗，并随命运支配生活（甲的生活比乙的好吗？）。这些，再加上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依附性的不可选择，就动摇了建立在有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机构的理论。（详见本书第一幕）

## 自由主义普遍主义

持第二种意见的社群主义批评家说，即使自由主义关于自我选择的概念没有矛盾或不正确的成分，自由主义者对于社群与社会大背景的重要性仍视而不见，以致使他们的学说没有实际意义。麦金泰尔写道，现代自由派个人主义要求我们从习以为常的那些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开来，而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赖以理解我们的责任和利益的依据。自由主义认为，脱离了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真正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从而也是普适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不受任何派性、不公平与片面性的影响。<sup>17</sup>当今应用这个方法的最有名的论点是罗尔斯提出的。他说他的正义原则会被持初始立场(original position)的人们所接受。这种初始立场的优点在于，它允许我们“从永恒的角度”，<sup>18</sup>从任何时空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情况。但是，为什么生活在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生活中的人会为一种由理想化的自由平等的人所制造的政治伦理欢呼呢？在新加坡，我们大多数学生似乎对他们相对仁慈的家长式政府十分满意。我尽力向他们解释，他们对政府应有一种愤怒感，因为这个政府限制他们的自由并且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我还说，许多新加坡人在开始生活时，不能得到一份平等的社会资源，政府可能需要实行一些十分激进的政策来弥补

他们社会中的不平等。这些政策有资产国有化,对弱势团体的照顾政策(affirmative action),鼓励工人所有权,补助家庭妇女,公共医疗和免费大学教育等等。<sup>19</sup>对我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必须了解新加坡的具体历史与特殊情况。他们说,新加坡是个小都市国家,它缺乏自然资源,为潜在的敌对邻国所包围。近代史上充满了致命的贫穷与民族冲突。你的理论是不适用于这样一个小城邦的。在这种时候,我只能转到下一个问题:(我论述的)罗尔斯的正义学说,和学生前面上的关于保加利亚戏剧的一课同样地没有什么效果。<sup>20</sup>

沃尔泽在他的《正义的领域》里提出一个关于道德与政治思想的比较有力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不应从客观的、具有普适性的原则出发,而是应该从传统出发,向自己的同胞解释我们共有世界的意义。<sup>21</sup>人们较容易理解产生于他们实际生活和自我了解中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因此,从事道德说服工作的哲学家们应把他们的学说建立在特定历史状态下产生的准则与制度上,而不是去寻求永恒的正义原则(详见第二幕)。

## 自由原子主义

**第三种批评者争辩说,自由主义学说可能有现实力量,但是它们对我们的社会有危害。**这些批评者认为,自由主义造成了,或者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到与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的原子主义倾向有关的负面的社会与心理作用。现时社会中无疑地存在着令人担心的不顾社群与社会义务的无情无义的个人主义倾向,而自由主义学说似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自由主义允许过多的政府干涉,从而使那些已经



并且还在继续破坏人们对社群感情依附的政策合法化。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能够并且应当干涉，以保护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并确保物质财产的公平分配，而不管后果如何。泰勒问道，在一个充满生命的虚掷和普遍的社会病症的时代里，我们应当转向国家，以纠正偏离正义原则的现象，而置社群精神、友谊或传统的角色于不顾吗？<sup>22</sup>瑞典人正在吃惊地发现，他们对自己的福利国家（也许是最接近罗尔斯的正义学说的模式）的过份热衷，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竞争力，而且损害了处于他们无所不包的国家保护伞外边的家庭与社会联系。

另一方面，由于自由主义学说坚持国家中立，不适当地区限制了政府行动的合法范围，从而不能考虑制订或恢复社群意识的政策。这个学说认为，国家应避免告诉公民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因此，它不能借助于社群的概念来为其政策辩护。但是这种观点会导致奇怪的、可能是非民主的后果——我们（或者最高法院）应当反对一切旨在增加社会责任，保持那些使生活有意义的与社群联系的非中立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得到公民具有压倒多数的支持，而遭到某个宁愿过一种无根基的和反社会行为的生活的人的微弱的反对。（详见第三——四幕及附录二）

## 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化”

社群主义的批评已经对自由主义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著名的批评者不愿意表示他们属于社群主义理论阵